

大气治污,企业为何积极性不高

孟书强

面对严峻的空气质量形势,强化行政监管成为环渤海地区各地政府祭出的共同法宝。在中央政府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地政府今年以来迅速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开罚单,关厂房,甚至为此解职了部分治污不利官员。不过,从目前来看,大气治污还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吆喝,作为治污主体的企业却并没有积极动起来,至少没有主动动起来。

在治理大气污染这件事上,不少地区的政府和企业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处在“打游击”的博弈状态。政府政策紧了,企业就抓紧响应,摆出治污的样子;一旦政策松了,治污就被束之高阁。一些企业只在应付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平日设备闲置或不持续稳定运行,政策严了就用,政策不严就不用,甚至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

共享同一片天空,面对共同的责任,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和政府部门打游击,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吗?恐怕不能完全说得通,毕竟清新的空气是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人更长远的“利润”,想必企业内的经营者们也都明白这个道理。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当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具备可行性的时候,污染排放企业才会采取合作策略,购买治污设备。反之,则采取不合作策略,拒绝购买。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拒不购买治污设备,



王利博制图

则政府有关部门就会发现由于执法成本过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管制法规,而采取次优法规,相关法规的效果亦随之大打折扣。

显然,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的可信性受到了企业经营者的质疑。究其原因,这和长期以来,我国运动式的环保治理方式不无关系。据《经济参考报》报道,作为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户”,火电、钢铁等企业人士纷纷反映,当前的环保监管体现出浓浓的“长官意志”,相关政策的非延续性和“变通性”,导致基层的火电厂、炼油厂难以招架。

因为政策的多变性,新建成的部分环保设施不久又要进行二次改造,让部分企业无所适从。这必然使政府部门有关治污管制法规的可信性受到质疑,相关企业也相应拒绝或延误购买治污设备,陷入和政府部门的游击战中。

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可能是不少企业治污积极性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当然是治污的主体,政府部门显然也应该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部门应多思量相关政策法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真正让法律起到震慑作用,不

能为了制定政策法规而制定政策法规;要制定区域性的中长期的大气污染防治时间表和路线图,避免政策的多变性,增强政府的有关治污管制法规的可信性,让企业有合理的投资和回报预期。

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依赖政府部门和排污企业的游击战断非长久之计。因此,要治理大气污染,仅需要改进区域性法律法规,制定区域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总体规划,还需要多部门、多地区联合行动,将这些措施长期有效地坚持下去。

人物

郑保卫:中国气候传播的民间旗手

本报记者 赵玲玲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2011年12月11日,在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刻,面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在气候污染问题上的不断指责,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发火了。

一年以后,在2012年12月的多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的一场边会上,联合国一位气候变化的高级官员引用了《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并据此对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作了肯定,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国家的质疑。而这项调查的实施者正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保卫领导的中国气候传播中心。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

从“传统新闻学”转战“气候传播学”

郑保卫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者,他兼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在新闻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短短几年时间,他却变成了我国气候传播研究领域的旗帜。

是哥本哈根会议把他推向世界气候传播的前台。2010年《中国日报》记者付敬和香港乐施会传播经理王彬彬的意外来访,使得郑教授的研究兴趣发生了重大转向。这两位来访者都参加了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让人们无法接受的是会议后期,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媒体将会议未能取得积极成果的责任推到了中国的头上,西方媒体的负面舆论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形象。一场气候影响政治的舆论战争摆在面前。

哥本哈根会议后,许多中国人都在反思,为什么总有人在国际舞台上抹黑中国?长期坚守“保卫新闻学”阵地的郑保卫在听完两位来访者对于这次会议谈判一波三折的讲述后,意识到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认识到了从传播角度介入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家专门致力于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2010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了。

同年5月,项目中心召开了“气候、传播、互动、共赢——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要强调“政府主导,媒体和NGO推动,企业主体和公众参与”的思路。

力研讨会”,70多位来自联合国、中国、美国、英国、巴西的中外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NGO人士应邀与会,共同探讨如何在气候传播中加强三者间的交流与互动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这次会议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重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委托哥本哈根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第一炮打响了,这也标志着郑保卫教授实现了从“传统新闻学”到“气候传播学”研究的第一次转向。

由“中国学者”成为“全球气候传播者”

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郑教授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研究队伍也是一只手可以数清。郑教授组建了一个“铁三角”研究团队,除自己外,另两人是自己的博士生李玉洁和乐施会的

传播经理王彬彬。由这三人组成的团队2010年底前往墨西哥坎昆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大会,并举办了“基础四国与墨西哥气候传播策略”国际边会。

当时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边会举办地是一个地面凹凸不平的运动场,主席台、音响、桌椅都须自己准备和布置,郑保卫三人用了不到24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会务准备工作。在边会上,郑教授代表中国高校研究机构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舞台上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继坎昆边会之后,郑教授带领的气候传播团队接连参加了南非德班、卡塔尔多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并都举办了自己的边会。经过多次国外办会的实际锻炼,他们举办国际边会已是驾轻就熟。与此同时,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并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际学术圈。

自里约开始,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举办的边会就被纳入了中国代表团组织的“中国角”系列边会之中。郑保卫在里约期间受邀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年”边会,此外,还参加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并作主旨演讲的“地方政府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边会,作为一个中国气候传播学者,他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媒体、NGO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的传播理念和方式在不断调整和改进,收到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好,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表达,正义之声得以彰显,这样的结果应当也包括郑教授领导的气候传播团队的努力。

对此,郑教授自己很淡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地球上的普通一员,每个人都应该是全球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和行动者。

从“国际领域研究”到“国内公众调查”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郑保卫领导的项目中心的工作从主要关注国际领域开始国际国内并重:一方面继续关注政府、媒体、NGO以及企业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传播战略、策略和方法,看他们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气候传播技巧,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看公众,看其是否了解气候变化和气候传播,是否认识到自己该为气候变

化做些什么……郑教授形象地将其概括为“两头并进,双向使力”。

近年来,郑教授所领导的中国气候传播中心先后进行了《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和《中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及行为》两个全国性调查,以了解公众对于气候变化和低碳的认知。同时,还举办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四进”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升国内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之中。

近几年在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大会过程中,郑教授也目睹了一些国内企业、媒体和本土NGO人士亟待提高沟通与传播能力的案例。一些国内机构与国外机构以及国内其他机构相互之间还缺乏有效的互动,没有形成合力。特别是2012年6月,中国企业代表团在巴西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的表现,让郑保卫感慨颇深。

此次会议期间,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的代表在中国角举办了一次“可持续发展”倡议书发布活动。眼看着活动就要开始了,一些企业的代表才陆续来到会场。台上几位企业家在念稿发言,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国外观众更是屈指可数,场面显得有些尴尬。

对此,郑保卫感慨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以及平时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的气候传播都是需要讲究策略的,要遵循国际规则,要讲究传播技巧,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看来我国企业的气候传播需要很好地总结和提。”

郑保卫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要强调“政府主导,媒体和NGO推动,企业主体和公众参与”的思路。没有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扶持,没有媒体的推动和监督,没有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对低碳经济的投入,没有公众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参与,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企业在防治大气污染中,要发挥主力军作用,可以说,如今气候传播问题在我国企业中还没有真正破题。

郑保卫的项目中心今年10月11日—13日将与美国耶鲁大学共同主办首届气候传播国际会议。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竖起气候传播的旗帜,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气候传播研究的一次成果展示。郑保卫在提及项目中心未来的工作规划时显得尤为兴奋。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李玉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对话

专访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中国污染治理之路与发达国家大不相同

本报记者 王敏

“时过境迁,今天我们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7月20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如此表示。

《中国企业报》:曾经有一个调查,中国和日本将“石油和煤炭消费所致二氧化碳增加关联的地球温暖化”列首位(71%和70%)。而韩国将其列为第2位。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林伯强:这个调查离目前老百姓关心的集中排放、雾霾很远。二氧化碳老百姓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东西他是不关心的。一般而言,除非发达国家比如欧盟等对可持续比较关注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担忧,一般老百姓担忧的是自己身边的事,而二氧化碳是整个地球的事。

就中日韩三国来说,现在日本已经过了雾霾的阶段,如果说日本比较关心二氧化碳,这个有可能,因为他没有雾霾和地面排放可以担心了。韩国也快过去了,介于中国和日本中间。而中国目前正处于雾霾严重的阶段。

造成雾霾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汽车尾气、城市建设、地形构造等等,但是,大量消耗能源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主要原因,这也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改善的呼声。

《中国企业报》:在您看来,中日韩三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各有什么特点或者说优势?

林伯强: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发展到10%及以上速度增长的时候,雾霾比中国目前还严重。

日本的治理方式首先是改变能源结构,减少煤炭的消耗。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的煤炭都控制在20%以下,日本也在20%多一点。其能源消费主要是核电和石油,核电大概占到其能源结构的20%—30%。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9%还要多一点。这样的能源消费比例下雾霾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国家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似乎向人们展示这样的推论:即快速增长发展阶段(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尽快超过对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对环境有利的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跟发达国家当初面临的环境已大不相同,高速增长阶段将面临资源短缺,资源价格会持续走高,工业化的剩余可能不足以用来消除外部的不景气。同时,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极端气候也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这样,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除了更困难和成本更高,是否真正走得通,尚未知。

而且很多经验是学不来的。比如说日本的核电占比高达30%,中国目前只有10%左右,甚至不到这个比例。由于日本的核泄漏事故,全世界对核电都在反思中,日本本身也在寻找替代核电的道路,中国要上马核电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从长远来看,核电是绕不过的一个方面。

再说石油,如果大规模地进口石油,成本会不会大大提高?又会影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企业报》:这些年,中国对大气污染治理等环境保护问题日益重视起来,但还是不断有严重污染的案例接连被曝光,该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呢?

林伯强:现在工业排放标准已经有了,还可以更严一点,其实就两点:一个是排放标准更严,一个是执法力度更到位。理论上讲,治理排放没那么难,英国也就用了10—15年的时间,当然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付出成本,另一个就是以什么替代,能源替代很困惑,什么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接受?如果不在乎成本,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乎成本,就很难。

排放标准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很多情况下是有标准的,但不执行是没用的。罚和管要结合,要同时进行,靠自觉是不行的。

《中国企业报》:您曾经说过,中国的环境污染某种程度上仍在积累过程中,只围绕某些成品油油质而小修小补,将无益于环境改善,彻底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尽快设立强制性工业排放标准,才能真正摆脱雾霾天气。那么,您认为中国的污染治理之路会是什么样的呢?

林伯强:时过境迁,今天我们面临的污染方式、资源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大为不同。发达国家经验说明,在工业化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这里“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很重要。目前的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在庞大的人口压力下,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是否会使得环境污染接近或者超过资源和环境的临界点?是否会过了临界点而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而且,我国某些形式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已经是不可逆的。我国环境治理的困难会很大。首先会加大整个经济运行的能源消耗量,其可行前提是有大量低廉的资源供给。

一般来说,环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投入构成变化及生产技术进步,除收入水平外的其他几种因素受资源价格驱动。因此,相应的政策组合应该是: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通过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资源成本,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能源强度降低和废物回收利用率提高,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

改变能源结构很难,注定路程很漫长,在城市里把污染转移出去,对提高工业排放标准,加大惩罚力度,都会有所帮助。另外,我觉得核电是不可避免的,天然气、核电、可再生能源等,应该是未来中国能源替代的选择。